

## 落花无言 人淡如菊

陈慕容

王世强先生是北师大数学系“四大金刚”之一，他的学术成就已有很多记载。2005年出版的《王世强文集》，选有他的全部论文和著作目录，可更系统地看到他的科研成果。他是数学界的知名人士。

我要写的是王先生另一个侧面，他的趣闻逸事、生活点滴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高不可及的名人，而是身边一个有趣的普通人。从一些小事折射出他的人格魅力和独特思维。

### 一、王先生与 1952 级：亦师亦友

上月和在美国的刘钟灵通电话，谈到王先生与我班的关系，我说“亦师亦友”，她补充说：“还是好朋友。”王先生在我班上课时间最长，对同学关心帮助最多。而我们给他惹的麻烦却最大。

我班二年级才上《高等代数》，王先生肺病初愈，刚恢复工作，我们有幸成为他第 1 届学生。还没上课，任课老师的信息已经传来，听说王先生毕业时清华大学要他，傅种孙先生不放，说：“若你留在北师大，我立刻给你讲师职称。”清华大学是名校，条件比北师大好，对年轻人确有诱惑力。而王先生的回答却是：“北师大是我的母校，即使不当讲师，我也应为她服务。”听到这番壮语，对王先生充满好奇。

我刚入校时不懂事，贪玩淘气，学习一般，却戏剧性地当了《高等代数》课代表。我觉得应在上课前与王先生联系，也想先见这位传奇老师。但去了几次办公室，都没人，后来得知他不大去办公室，这时已是上课前一晚了。所以我和大家一样，上课才见到先生。

1954 年元旦，班里开联欢会，王先生在北京没有亲属，班长韩丽娟让我请他参加。他很高兴，买了一包糖。当时学生穷，会上连水都没有，这包糖给联欢会增添了不少亮色。因为只有一位老师参加，自然成了目标，同学让他表演节目，他毫不犹豫地唱了一首《黄河颂》。浑厚的音色，像受过专门训练，唱得很有水平。以后他常参加我班活动。1955 年元旦，在男生宿舍走廊里，王先生带来苹果，也唱了歌。

王先生给我班上过《高等代数》《伽罗华理论》《近世代数》。《近世代数》是选修课，他讲得很特别，用一节课将课本内容讲完，另一节课讲前节的拓展。如讲集合，后一节就讲各种悖论，讲数学危机。以前只知道有经济危机，那知数学也发生过三次危机，我们大开眼界。这后一节课我们最爱听，内容有他的研究成果，有可以思考的问题，丰富多彩，大大地拓宽了我们的思路。

1952 级是院系调整后招的第 1 届，进校时就有 3 多：第 1 志愿生多，学习好的多，年龄小的多。那年动员高中毕业生报考师范和地质。本来我第 1 志愿是清华建筑。听了动员，不加考虑就把第 1 和第 2 两个志愿对调了。我班同学大多属鸡、狗，属猪就是少数。我和罗里波属鼠，王继平属牛，进校时 15 岁。已经上课，他才报到，坐在门口，穿了一件咖啡色胸前带细格的外衣，还没变声，心理学辅导老师悄悄问：“这个同学是男生还是女生？”

我班进校时 72 人，毕业时剩 63 人。这时又添了 3 多：有 19 人留校，在数学系历史上是空前的。14 人考取研究生（本校 10 人）。还有一多便是划的右派多。数学系 5 个教师右派中我班占 4 人，本校考取的 10 个研究生中划了 7 个右派。我班还有个特殊人：罗里波，他在三年级就和王先生在《数学通报》上发表了论文“用牛顿法求实根上下界的精确性”。特殊的班遇到特殊的老师，自然会发生许多故事。

“向科学进军”口号提出后，胡耀邦（当时是团中央书记）来我校做报告，大会批评了我班不发展学习好的同学入团。会后还来到我班，与部分同学照了相。新中国成立时，我们初中毕

业，同学们在新中国成长，受党的教育，拥护社会主义。胡耀邦就是阐明此观点，认为这些同学申请入团，是要求进步，应当肯定。以后王继平很快入了团。

那是知识分子的春天，我班课外读书小组也在这形势下成立。王先生发起，系党支部很支持，派党员严士健先生参与指导，我任组长，14名同学参加，读些小论文，思考些小专题。王先生出了些小题目让我们做，给我和王家奎的题目是“关于复数的定义”，王先生列好提纲。但我们做了一半，没做下去，王先生代庖了。他用了反同构，我们没接触过，不可能想到，也说明我们并无数学才华。即使这样，先生也认为是新事物。1956年初夏，数学系组织了第1次学生科学报告会，材料是油印的，封面还用了红色油墨，标题是：关于代数教材的几点注记，王先生写了前言。会上，王继平报告了“对普通运算律的讨论”。王家奎和我报告了“关于复数的定义”。罗里波的论文“有限结合系和有限群”也在材料中，因已经正式发表，没报告。1958届程应矩，报告了“行列式的定义”。会议结束，王先生很高兴，带我们去学联社吃饭。那时王继平已长成一个高大帅小伙，一行人浩浩荡荡，走在街上很显眼。遇到一位同学，调侃地说了一句：“去庆功吗？”虽然我和王家奎做的工作不多，但王先生为了培养我们，付出的巨大心血，我们永远铭记。老师的神圣在于无私。

暑假等待分配，指导教师和小组成员同游颐和园。要划船了，王家奎组织能力强，他主动安排，让王、严两位先生和我坐第1条船，这条船自然需重点保护，他扫视了一下大家，派了朱嘉城，朱曾是舢板队员。小船离岸，王先生和朱划船，严先生掌舵，我在船上摄下他俩划船的镜头。这是大学阶段最后一次活动。

读书小组在代数研究班延续，读了英语论文“约当代数”，人员少了许多。刘绍学先生也参与指导。

那段日子是难忘的，在老师们的教导下，我们打下了坚实的业务基础。那段日子也是无忧无虑的，教室、食堂、宿舍三点一线，欢快愉悦，少年不知愁滋味。谁能想到以后竟会发生那么多事。也许，“乐极生悲”是客观规律。

当时理科在北校，是辅仁大学原址，著名的恭王府是其一一部分，女生宿舍在恭王府内，称“二院”，进门一直往里走，拐弯还有门，进门后两边各有一个琴房，不锁门，谁都可进去弹。估计这两间房以前是下人住的。再往里走到尽头，有座院落，女生和单身女教师住在那里，那真是深宅大院，门口一老头看守，男生不能进，有事打电话，女生出去见。所以当时常能听到“xxx内线”的喊声，大家心照不宣，知道有男生找，也可算当时的一道风景。

进门左拐是肺病疗养院，环境幽雅，竹影婆娑。传说恭王府是《红楼梦》中大观园的一处原型，想这里该是潇湘馆，就这么称它了。王先生和罗里波都住潇湘馆，早就认识。上课后，王先生又发现罗里波有数学才华。老师爱才，天经地义。没毕业，俩人就合写过3篇论文，第3篇论文“有限结合系和有限群(I)”发表在《数学进展》上，是半群的雏形。80年代末，兰州大学半群专家郭聿琦对我说：“当时，我上一年级，看到这篇文章，很感兴趣，正翘首以待，却没了下文，后来才知罗里波被划为右派。”言谈中不无惋惜。郭聿琦也对王先生说过：“日本有些数学家已在此基础上作了很多发展。”可见此文在国内外的影响。设想，若不是反右，罗里波可能成为半群的创始人，那么，数学系会不会多一个金刚？

1953年，匈牙利数学家P.Turan来我国讲学，王先生在由华罗庚主持的报告会上用英语宣读了论文“关于合同关系的可换性”，那时，能用英语报告论文的人不多，因而引起轰动。消息很快在班上传开，我们对先生更充满敬佩。临近元旦，班长让我给王先生写一封慰问信，我写了，信中表达了对先生的感激和赞扬。我政治观念薄弱，信中没突出政治，班里好象不满意。此信是否用了，或有人改写，我没问。是否还给其他老师写？我也不知。但那年元旦只请王先生一人，可以看出他在我班同学心中的位置。

数学系1954年搬到新校时，条件很差，只有一座物理楼供教学用。学生宿舍盖了西斋南楼。单身教师宿舍在教学楼与学生宿舍楼之间，是东、南、西、北四座三层楼房，我们称它四合

院，王先生住东楼。四合院中有个大院子，地面还没铺好，雨后一片泥泞。那晚我有个问题急于找先生，天色已晚，没有路灯，只有星点稀疏灯光从窗中射出，地上一团漆黑，我脚下一滑，仰面朝天，跌入泥潭，只好懊丧地回宿舍。

我因课代表身份，和王先生接触多些。先生对我的定位是“不可能成数学家，但通过努力，可做一个较有水平的教授。”我本胸无大志，也有自知之明，这个定位已经很高。他对我的鼓励，使我用功了。

那时，许多同学爱去王先生家。罗里波与先生关系最密切。刘钟灵也常去。二年级时，王继平学英语，看书时生词太多，查字典费时，便把生词写到本上，请王先生帮忙。按说这是学生对先生的非分要求，可先生耐心地作了中文注解，王继平再看书就很顺利了。这个本子有好几十页，那密密麻麻写满英文单词的厚本，渗透着先生浓浓的情谊。王继平后来当资料员时，除英语、俄语外，还学了些法语、德语。他说：“当年王先生给我作注解的那个小本，一直伴随着我。我划右后，用业余时间学外语，这点毅力也是拜先生之所赐，这个本子我会永远留存。”

先生已从老师变成大家的朋友，有事求他，无不应允。直至现在，我班若有同学去北京，集合地点就在他家。看望王先生、照相、去实习餐厅吃饭，是我班同学的聚会三部曲。

朱光琼有一时期在先生家学小提琴。王先生有一把小提琴，一天，我、罗里波、王隽骧都在，他拿出提琴，王隽骧先生拉了罗马尼亚的《云雀》。我们让王先生拉，他推托，说自己拉得不好。我们起哄，他拉了《白毛女》，音很准，因他也是初学，技术还欠缺。他自嘲说拉得象杀鸡，还说：“我这把提琴太差了，提琴家的琴肯定是特制的，所以拉得那么好听。”当时我还不以为然。以后知道提琴家的琴的确是特制的。但我想，这样的琴在我们手里，拉出的声音还是杀鸡。

一次去先生家，很多人在。在北师大，助教三人住一屋，王先生是讲师，一人一间，很多单身助教休息时也常去他家。闲聊中，王先生说：“吴品三的儿子把他们叫叔叔（指了一下王隽骧），叫我爷爷，纠正都不改。”他边说边笑，大家也跟着笑。这本是小孩不懂事弄出的笑话，后来我却惹了事。1958年我已当了右派，因处分轻，还留校上课并实习。王先生指导我和蒋滋梅，对待我们一如从前，我们也很放松。一次听完试讲，王先生带着儿子进来，让儿子叫王先生。我鬼使神差地脱口而出：“叫爷爷。”王先生惊诧地看了我一眼，我自知失言，已覆水难收。实习总结会上，有人指着我们（我、蒋滋梅、黄涵坐在一起）说：“这三个右派不知自己是什么人了，陈居然让吴先生儿子叫王先生爷爷。”我一惊，心想一场批判肯定不可避免，但主持会议的张禾瑞先生只轻描淡写地说了：“是不大好，以后注意”八个字。张先生调子一定，别人不好再说。风乍起，就平息，我感激万分。如果说这次给王先生惹的只是小麻烦，那么下面惹的却是大麻烦。

本科毕业，我回了趟家，家里希望我去上海工作。分配方案宣布前一晚，我心情烦躁，去了王先生家，流露出想去上海之意。王先生说：“你去不成，研究班已录取。”我班女生有4人考了代数研究班，想知道以后会与谁常相处，就问：“女生中还有谁考取了？”王先生说了蒋和黄。“曾美美呢？”我问。“她留校。”估计王先生认为第2天就宣布，且那晚我心情不好，才告知的。回到宿舍，黄也在焦躁不安。那晚，很多人心神不定是自然的，除非有人事先知道。实际上，事先知道消息的人绝不止是我。黄担心研究班考不上，我心一软，说她考上了。她也问到曾，我如实相告。她一听就哭了，她俩关系好，不愿分开。黄哭着去找曾，我和曾不知所措。

而带给王先生最大的麻烦是：反右时，我班在北师大的10名研究生有7个右派，在科学报告会上报告的3人和罗里波都是右派。这笔帐全记到了王先生头上。1958年双反，重点批判了王先生，说他培养了那么多右派，是最大的浪费。给他贴了很多大字报，其中一张大字报中说：“……王世强居然把分配方案透露给右派分子陈，而陈在班上大肆宣扬，影响极

坏。……”事实并非如此，但当时很多大字报都是这样夸大的。我看后很难过，觉得对不起王先生。没想到先生在我班所花的心血，却得到这样的回报。

我成右派后，路上没人理我，我也视而不见。一次进四合院，正巧王先生迎面走来，我侧身避过，王先生从后面叫住，我以为有事，但他没话找话，含笑问：“去哪儿？”“去教室。”我说完就匆匆走开。他是第1个在路上与我说话的人，而且是老师。这个场景在我脑中挥之不去，先生宽恕了我。1954年，就在这个地方，我摔了跤，当时就爬起了。时隔4年，我“摔”了跤，20年后才爬起。

罗里波等4人在整风时贴出了题为“岂不令人深思”的大字报，立刻引起轩然大波。一反右，他成为研究生班重点批判对象，还让他交出大字报底稿。罗与王先生关系密切，有人怀疑大字报王先生修改过，想顺藤摸瓜抓王先生。罗拒不交底稿，就越怀疑。后罗说底稿烧了，此事便成谜团。抓王先生没成功，系里阻止了。数学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，保护了几位有才华的老师，也很不易。罗坚持己见不认罪，大小批判会开了很多次，最后拿出杀手锏，发动了罗的父母。一次开会，罗站在讲台右侧接受批判，还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会开到一半，主持人上台，读了罗里波父母的来信，罗的父母都是老师，信写得真切感人。大意是：“……罗里波有小聪明，家里比较宠爱，所以骄傲任性。现在犯了错误，我们也有责任。……希望他好好认罪，接受改造，否则会自绝于人民……”刚读完，罗举起双手走下讲台，边走边说：“我投降。”数学系学生中最顽固的一个“堡垒”被“攻克”。罗被划为极右，送去劳动考察，后去了内蒙。

1978年，罗里波被王先生招为硕士研究生，那年他42岁，已过了报考年龄，王先生为此给方毅同志去信，罗被破格录取。实际上，罗在上学时，就是王先生的研究生了，他没有参加读书小组，与王先生单独联系，只是没有名份。现在他必须有名份，否则无法从内蒙回来。王先生惜才的良苦用心，闻者无不动容。

这件事在进修员中传的却是：“当年罗里波烧了底稿，保护了王先生，王先生为报恩，将罗招为研究生。”这种带功利性的推断，是对王先生的亵渎，但我无法辩驳。直到2004年，王继平说了详情：“那张大字报是罗起草我修改，文章的题目、开头、结尾是我定的，我用毛笔写成大字报，与王先生毫无关系。罗里波后来交出了底稿，洗清了王先生的嫌疑。”真相大白，证明了王先生的品格：高尚无私。

我班10人考取本校研究生，分析、代数研究班各5人。令人悲哀的是：1957年初分析研究班xx就因偷书被劳教，其他9人又划了7个右派，一个中右，剩下只有一人，别人称他“唯一的”，他是代数研究班副班长，唯一的革命派。双反时，大会批判王先生培养了“九个右派，一个小偷”。与事实不符，小偷明明在分析研究班，与王先生风马牛不相及，怪罪王先生实在离谱。

我没拿到毕业证，分配到青海。临行，我没勇气去向先生告别。他还有许多书在我那里，我用旅行包装上去他办公室，四顾无人，把包往他办公桌上倒，书堆成一座小山，顾不上整理，急忙离开。

1958年8月22日，我和黄登上西去的列车，离开北京。北师大6年，在涩涩的酸楚中结束。

## 二、金刚是这样炼成的

1927年3月30日，王先生诞生在石家庄。那时他父亲27岁，母亲29岁，在20个世纪20年代绝对算晚育了。先生是独生子。现在说起独生子，会连想到“娇生惯养、骄纵任性”等词汇，但王先生不同，他的家教甚严。

先生的童年在战乱中度过，加上父亲工作调动频繁，无法正常上学，启蒙老师是父母。先生

四岁开始识字，并给祖父、母写信。父亲每天下班后，给他讲三国、水浒、西游记和聊斋里的故事，还订了《小朋友》周刊。7岁读《平民识字课本》和《故事画册》。

1935年，到了石家庄东的辛集镇，才去正规学校插班读四年级。王先生的小学生涯从四年级开始，那年先生9岁。五年级读完，又逢“七七事变”。全家逃难到郑州、汉口。后父亲又奉命去天津，路途需经郑州、济南、青岛，再坐海轮去天津法租界，到天津后，生活暂时安定。因为没学英语，在天津广东小学重上五年级。1939年暑假，先生小学毕业，考取“新学中学”。本来该读六年的小学，先生只读了4年，乃一奇也。

那年夏天，天津发大水，一个多月水不退，水深一米以上，黑臭无比，生活不便，学校也无法开学。先生的父亲在春天被派到甘肃武威，母亲就决定去武威。那时从天津到武威可不容易，他们从海河先到塘沽的海边，再登上一艘英国海轮去上海。登上海轮不久，先生就病了，昏睡不醒。船长知道后，让先生母子在烟台下船治疗（本来此船在烟台不停），还在他们的船票上签了：“以后可凭此船票乘本公司的任何船去上海。”在战乱时遇到这样一位好心的船长，也是先生的福气。

先生在烟台下船，住院五、六天后才清醒，他母亲未阖过眼，脸瘦了一圈。医生让她住院，她坚决不肯，尽快去了上海。因有的城市已经沦陷，必须绕道而行，从上海到甘肃的路线是上海—香港—越南海防—昆明—贵阳—重庆—成都—西安—兰州—武威，到达武威已是1940年初了，真可谓长途跋涉。先生见了世面，算意外收获，辛苦的是他母亲。

我问先生：“您小时候淘气吗？”我想，聪明的孩子会淘气，若能得到先生儿时淘气的事例，写出来该多么有趣。但先生的回答是“不淘气”。我不信，让他好好想。许久，告诉我两件事，都是7岁时在定县清风店镇干的。其一：看到一个光身小男孩，便往他身上撒了泡尿。其二：当时，先生的父亲是清风店中国银行的经理，一天，请了一位理发师为职工理发，先生在旁边玩，顺手拿起剃刀，在理发员脖子上划了一刀，流了血，吓坏了。我问：“挨揍了吧！”“没挨，他们没告诉我父亲。”对7岁“狗也嫌”的男孩来说，这几件事实在算不了什么，先生说的没错，他是个不淘气的用功孩子。

童年的颠沛流离，先生小小年纪便认识到国家兴旺与个人前途的关系，也培养了坚韧的性格和刻苦顽强的自学能力。先生到武威，插班入甘肃省武威中学读初一下。他初二自学了初三课程《平面几何》，初三自学完高中课程《三角》和《解析几何》。初中毕业，考取甘肃酒泉河西中学高中部，这是一所用“庚子赔款”办的学校，质量很高。在河西中学，先生考第2名，第1名戈革与先生是好友。1944年，先生高二读完，以同等学力考取兰州西北师范学院（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北平，恢复原名），中学读了四年半，就考取大学，又一奇也。

我去先生那里，未见桌上放过书，总以为他是天才，读书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。80年代，遇到先生的一位大学同学，他说：“王世强是书呆子，用功得了肺病。”“书呆子”称号我不苟同，但知道先生的成功是天分加勤奋。

大学一年级，先生学会了围棋，每晚赶快做完作业就找同学下棋，达到痴迷程度。到了熄灯没下完，半途而废就十分懊丧。因太影响学习，先生痛下决心戒掉。戒棋犹如戒烟戒赌，并不容易。特别在入迷之后，看到别人在下，会不由自主过去看、支招。而先生可以“忘掉它到不会下”的程度，毅力惊人。如果先生继续痴迷，潜心研究围棋，依他的智商，会不会取代陈祖德，成为全国冠军？那么先生的名声会比现在更响。

以后他专心致志学习。课余自学吴在渊著的《数论初步》，日本圆正造著、萧君绎译的《群论》上册，金岳霖著的《逻辑》。二年级上《理论力学》，课本是影印的英文书，在兰州买不到，先生托了在昆明的同学戈革。买到后，陆地邮寄太慢，赶不上用，航空不能寄书，只好把书拆成几十份，用航空寄给先生。这种寄书方式，的确奇特。

日本投降后，1946年秋，先生回到北平，入北平师范大学读三年级。那时数学系在得朋楼，先生办了个墙报“得朋文汇”，写了3篇短文，被段学复先生发现。段学复先生是清华大学教

授，被傅种孙先生请来兼课，教《近世代数》。先生毕业时，段先生想让他去清华大学任教。这样的人材，傅先生当然不愿放，王先生也觉得应为母校服务，这样，先生就在母校工作了一辈子。

读大学时，先生充分展示了自学能力，他去北大听胡世华讲《数理逻辑》，听江泽涵讲《拓扑学》，只听开头几次，知道了用什么教材，便回来自学。四年级自学了 A.Church 著的《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Logic》学会了“形式化”方法。这种把普通数学论证变成象下棋一样的形式推演技巧，使先生不但在知识上，而且在数学思想上提高了一个层次。也感觉到这种思想可能会对数学的深入研究有帮助。果然，1961年后，国外有些数学家用数理逻辑方法解决了其他分支的很多难题。不久，先生又看了 A.Tarski 著的《A decision method for elementary algebra》，此书是机器证明思想在书本上的实现，对数学的应用更具体。它超过了前人提出的递归论、理论性的 Turing 机、算法论。先生觉得数理逻辑方法比《近世代数》《几何基础》中的公理化方法先进得多，因此在思想感情上对数理逻辑的认识有了飞跃。一次，他对张禾瑞先生说：“我和你这样下围棋：你走一步，我在对称位子走一步，那么，我俩永远是和棋。”想当时张先生肯定答以“收敛的大笑”（张先生的笑很特别，我班同学称他的笑是“收敛的”）。实际操作当然不行，对方叫吃，你再叫，对方已把你的子吃掉了。而且围棋盘 361 个交叉点，和棋极少。对方若占了中心位置，对称点在那儿？但若规定：不许提子，不能占中心位置，那么和棋便可实现。原以为王先生不会下围棋，后来知道他会下，那么这只是玩笑，但说明先生的独特思维。

先生的思维的确独特，他说：“在若干亿年后，有两个同样的人，在同样的地方，说着同样的话。”开始听到这些话觉得是天方夜谭，简直不可思议。但先生说话有根据，他在《一些事物的有限性》论文中证明了这点。

按《王世强文集》论文和著作统计，先生共有论文 74 篇，著作 4 部，还不包括 2006 年发表的论文“一些事物的有限性”，可谓多产，且质量高。有些论文和著作还是他退休后完成的。先生还培养了 13 名博士研究生，22 名硕士研究生。这些成就对一个精力充沛的健康人来说都是骄人的，而先生恰恰不健康。

先生参加工作不久就得了肺结核，那是 1948 年底，医生让他停止工作休息，他不得不住进中国红十字会防痨协会疗养院，那时的休养方式不科学。整天躺在床上，吃饭都不让坐起，不久先生就开始失眠。1950 年先生的父亲让他练气功“意守丹田”，开始效果特好，连护士都觉吃惊。半个月后就出了问题，忽然大口喘气，只得停止意守。1964 年开始长白癜风，1982 年冬的一个夜里，突然脊背发抖，以后便只能吃流食了。先生一直不知道为何出现这种问题，1983 年，遇到一位懂气功的中医岳大夫，才知当初练气功没有收功，长时间意守丹田，后果比刀砍斧剁还要可怕。岳大夫给先生开了秘方自制的汤药，吃了 3 个月，胃口就好了，但大夫说不能根治。到 1998 年旧病复发，找不到岳大夫，这样先生至今只能吃流食。而且失眠一直伴随着他，睡眠依赖安眠药。

在疗养院不让看书看报，先生利用这个时间考虑一个问题。一天夜里，已经躺下，忽然想出了解决办法。赶快起来打开电灯，写下证明。还很得意地写了一首小诗：“我解决了一个问题！这个问题属于逻辑。是问几个命题，彼此是否独立。我苦思冥想，得不到解决的踪迹。今天夜里，忽然一道灵光，闪过脑际！我急忙坐起，记录下思索的痕迹。从今以后，它不再是个问题！”这篇论文“命题演算的一系公理”1952 年刊登在《数学学报》上，是先生的第 1 篇论文。医生不让先生看书看报，他却写了 1 篇论文。医生不知道，否则会怎样处置？

1953 年先生的第 2 篇论文“关于合同关系的可换性”又在《数学学报》上发表。该文解决了 G.Birkhoff 在其《Lattice Theory》一书中的一个问题，在数学界影响很大。曾被两本讲《Universal Algebra》的书列为参考文献。在欢迎匈牙利数学家的报告会上用英语报告此文后，华罗庚想调先生去中科院数学所，被傅种孙先生拒绝。1956 年苏联数学家 A.I.Malcev 访问中国，

来到北师大数学系讲演，也因看到这篇论文而提到王先生。可见此文在国际上的影响。先生科研成果卓著，到“文革”前已发表了 20 篇论文。先生的数理逻辑方向基本确定，他对国外初起的模型论大感兴趣，这是数理逻辑的一个抽象分支。60 年代初，他在系里开设了数理逻辑选修课，从事格值逻辑研究，并培养研究生。

大跃进开始了，学校开展教育革命，批判资产阶级教学思想，那时我还没离校，学生上台发言批判旧教材，说几何公理法是形而上学的繁琐哲学，说现有教材脱离实际。1958 级一个女生上台发言说：“……为什么学生不能编教材，我们就是要编……”。接着，王先生就给学生编教材当助手。学生编教材，老师当助手，这个“助手”，先生会当得很好。

1974 年先生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破译了长城 203 台式机计算机的全部微程序，改进了这台计算机。并到北京分析仪器厂装在他们造的环境污染监测车上进行数据计算，还开到西单等处监测空气污染情况。作为新生事物，此车得到全国科学大会奖。

由于先生在计算机方面的成绩，1978 年，在中科院主持的一次数学规划会上，王湘浩先生邀请先生参加计算机方向。因无法兼顾，先生只能忍痛割爱。先生原来的数理逻辑研究已有国际影响，十年“文革”，国外数理逻辑有了飞速发展。先生认为：数理逻辑对计算机科学和数学都有重要作用，我们必须努力追赶国际先进水平。确定了数理逻辑科研方向，先生潜心投入，出版了专著《模型论基础》，用模型论解决了许多经典数学中的难题。他多次接受邀请去德国访问，与国外一些著名大学建立联系，互派学生和访问学者，有的还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。他为我国引进了数理逻辑模型论方向的研究，是我国模型论方向的带头人。

同时，先生和德国 Heidelberg 大学的 G.H.Mueller 教授建立了友谊。他们经常通信，教授还给先生寄他夫妇去欧洲各地旅游的图片。先生的失眠严重，国内的安眠药对他已无济于事，Mueller 教授给先生买安眠药。教授的儿子到北京，就给先生带过安眠药。Mueller 教授 2006 年逝世后，今年，他夫人还给先生写信祝贺春节，他们的友谊还在继续。

1998 年，先生退休。他的博士、硕士研究生沿着这个方向还在努力，先生的事业还在延续。先生只能吃流食了，身体也越来越弱。为了纪念傅种孙先生，为了全面地反映傅先生在基础数学、公理化及数学教育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，先生在退休后完成了专著《傅种孙与现代数学》，这是他献给老师的一份礼物，慰藉傅种孙先生在天之灵。

朱光琼问我：“下围棋和研究数学不矛盾，为什么要戒？”正因为先生对数学的痴迷，所以执着、专注。先生说过：“我早和数学结婚了。”那么岂能容第 3 者插足。

先生戒了围棋，没能取代陈祖德，但他和陈祖德一样，超越了自我。他以坚强的意志、惊人的毅力，在长期失眠的痛苦中，用衰弱的身体把自己锤炼成金刚。

### 三、人淡如菊

人生如同一首交响曲，每个乐章要自己用心去谱写。要谱写好这首乐曲并不容易，太多的不确定因素，让你不知所措。但好的心情就能谱出动人的乐曲，它能使干扰的音符不再刺耳，能使杂乱的断奏变成连续，并逐渐缓和。而好心情正是一生中惟一不能被剥夺的财富。王先生不健康，却长寿。因其乐观、坦然、淡定、从容。

在我班同学心中，他是个“好好先生”，见人总含笑，未见过他发火。我问他：“您生过气吗？发过火吗？”“我会生闷气，但不发火。”人生在世，会有许多不如意，怎么对待却是艺术。

70 年代初华罗庚教授在我国提出优选法，并成立《优选法推广小组》，后来不知何因，华与小组分道扬镳。1972 年王先生与同系徐承彝被派去小组工作，他们到时，看到北京日报上有关报导说：“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和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以及华罗庚先生帮助下……”当时组内已无北大成员，除北师大成员外，其余便是工人，组长也是工人。先生提出应把华罗庚放前面，组长说：“你们是组织，他是个人。”没有同意。但华不知道情况，以为这篇报道是王

先生写的，对他有了看法。以后小组出书（别人写的），写得不严谨，王先生提出意见，组长也不采纳。华又以为此书是先生写的，便说：“那本书是错的，不能看。”1980年，王先生因公事给华先生去过两封信，其中一封还用挂号，都没回音。华先生主编《中国大百科全书（数学卷）》，孙永生、严士健、刘绍学先生都是编委，不让王先生当。按说被大权威误会，应当去解释，王先生却泰然处之。我问：“您在意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在意，他管不着我。”1953年，华先生想调他去中科院数学所，幸亏没去，若去了，会怎样？……也不会有事，他能“以柔克刚”。

“文革”中，王先生因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罪名被斗过两次。一次是陪斗，坐了喷气式，没挂黑牌，由此总结了经验。第2次被斗时，他怕被挂上重的木牌或铁牌，事先用枕席缝上带子，写上“反革命分子王世强”，王世强三个字倒写，打上红叉，主动上台，低头挂上，学生只能暗笑。先生说“这是在‘文革’中他所见到最客气的批判，可载入吉尼斯记录。”我认为载入吉尼斯记录的应当是：“文革”中最轻的黑牌子：枕席，发明者王世强。“以柔克刚，战无不胜，”王先生是睿智的。

那时，知识分子学会了不少劳动技能，王先生学会了登三轮，修自来水管。一次与师傅在女洗手间套丝，师傅回去取材料，一位女生进去要洗脸，大声叫王先生“滚出去”，他就乖乖地“滚”出去了。“文革”中，对“有问题”的老师随便呵斥太平常了。王先生想：“这个女生现在已是老太婆，不知是否记得，若记得，作何感想？”现在造反派回忆“文革”（反右积极分子回忆反右）经历，定会：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。在美国时听人说：“当年在天安门上见毛主席，因主席说了‘要武嘛’而改名宋要武的宋彬彬，现定居美国，改回原名，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，说起当年经历，痛哭流涕。”有的造反派头面人物已写了回忆录，有人动员蒯大富写，若他写出，会很有可读性。

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系米尔葛兰教授做过实验，得出的结论是：当前人们仍处于一个权威教育下的盲从世界，在“权威”的影响下，寻常人的行为就会“越规”，这是因为人性里都有“傍大”倾向，以寻求自己的安全感。人的心里住着天使也住着魔鬼，他们是邻居。你接触怎样的强人，就有可能触动你内心的神、兽，或善或恶。所以在政治运动中，有的人心中的魔鬼占优势就自然了。但如果打破了对“权威”的迷信，这样即使有人把你心中沉睡的魔鬼挠醒时，你也会用天使的翅膀把魔鬼安抚入睡。

巴金晚年写了《从炼狱走来》，写他怎样被“解除武装”扮演“自己憎恨的角色”，又怎么从炼狱的圣火中觉醒过来的。这是一个充满曲折的“苦难历程”。巴老是文坛大家，反右时是积极分子，“文革”中是“牛鬼蛇神”。短短几句，深刻又经典。我们何尝不是经历过天堂、地狱，又在炼狱的圣火中觉醒过来的。

王先生在生活上的散淡与对专业的执著形成强烈的对比，他的居室不大，陈设更谈不上，有榻可眠，有案供书，一台电脑，其愿已足。他衣着随便，生活简朴，淡泊名利，乐善好施。1955年实习时，韩丽娟家发生变故，她家希望韩退学工作，同学得知消息都很同情，又无可奈何。韩毕业于上海格致中学（该校全国有名），在我班，她入学考试成绩最高，入学不久就当选为班长。她学习好，工作踏实，为人正直稳重，在班里威信高。而且三年级已快读完，觉得退学实在可惜。当天在王先生家，我说了此事，没想到他马上说：“太可惜了，我可帮她，你让她来找我。”“她会不好意思。”我知道韩的个性，怕她不肯接受。“算我借给她，毕业后还我。”我很高兴地把先生的话向她转达了，韩含笑不语。以后见她没有辍学，就放下心来，不再过问，我和王先生之间也没再提起过此事，所以我不知是否实施了，直到今年听马京然说起才明白王先生的确帮了。但如何操作我仍不知，也不必知道，先生帮助人从不声张。最近又得知，严士健先生也帮过韩丽娟。

王继平从西郊农场回来，曾在数学系当过四年资料员，1964年四清开始，下放到湖北恩施巴东县教书。当教师需块手表，无钱购买，向王先生借。先生说：“若是少量，马上可给，若



多则要去银行取。”那是个特殊的年代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，有人提出数学系把王家鑫、王继平等右派放在资料室是右倾。以后他们被下放，王家鑫去了教学仪器厂。王继平经过多年改造，反而越想越觉得自己没有反党，明显的“翻案”思想带给他的后果是：去了一个十分艰苦的地方。而先生却不顾王继平的身份，也未考虑钱数多少，痛快地答应。王继平只要 30 元，先生把夹在书里的钱拿了 30 元给他，他买了块上海牌旧表，当时一块新表的价格是 120 元。

那时一般人见我们会象瘟疫一样躲避。1965 年我们到过北京，一天，去首都剧场看话剧《赤道战鼓》，正巧北师大组织教师观看，我高兴地寻找，见到一位老师，前去招呼，他一脸茫然地问：“你是谁？”我报了名字，他噢了一声，再没吭气。见一个同学，我不知趣地又去招呼，仍是遭遇冷淡，我识趣地离开。那还是四清以后一年的事。而先生在当时就能借钱给王继平，钦佩的同时，思绪又回到 1958 年。

右派处理完毕，又有一个高潮掀起：双反和向党交心。那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，我无权参加，我们的任务是看大字报，写交待。数学楼里、楼梯上挂满了大字报。系办公室前被大字报筑起一道围墙。内容五花八门：尖酸刻薄的、言词激烈的、敷衍了事的。批判王先生的大字报不少，当然涉及罗里波、我，以及我们班的课外读书小组。

在阶级斗争的风浪里，若周围的人（包括亲人）出了问题，有些人划清界限，或积极地对他揭发批判，也很自然。但先生不同，他没给别人写大字报，只检查自己，他的大字报没挂在正厅，挂在楼梯转角处，只有一张。那天，我站在他的大字报前呆了很久很久。后来才有了先生在路上叫住我的事。

如果说人的心里确是天使魔鬼并存，那么先生的心中有魔鬼吗？我认为没有，或者说先生从小的教育，使他有足够的智慧让心中的魔鬼安然入睡。因此在纷繁复杂的政治运动中，他能波澜不惊，以他独特的分析判断能力坦然地对待周围的人，做着别人不敢做的事。

马京然写过：“王先生视金钱为粪土，把钱夹在书里，想象先生在台上讲课，从书本里飞出票子该多么有趣，可惜我不是他的学生。”王继平证明先生的钱确实夹在书里，不过，我当了他那么多年学生，课堂上未见过书里飞出票子的趣事。先生对金钱淡泊也是事实，不管是谁，只要向先生开口借钱，从不拒绝，即使有人借了不还，他也不在意。

“文革”后期，有位女老师从北师大探亲回青海，说数学系有位教授、单身，是个怪人，用麻袋装钱出去旅游，小偷不会光顾。我一听就知说的是王先生，当时脑中浮现出：“衣服破旧，背个麻袋，装着钞票，到处旅游。不住旅馆，在候车室，长椅当床，麻袋作枕”的景象。后又听到王先生穿件破棉袄，却带台半导体收音机，被民警认为是小偷带到派出所的笑话。我们问过先生，他否定。当时不解为什么会有如此离奇的传闻？看到他所写《补行大串联》后，才知并非空穴来风。1967 年先生想去串联，未准。1971 年冬，他提出自己去串联，虽未被拒绝，却不开介绍信。没介绍信，不能住旅馆，候车室当然是最好的住所。拿旅行袋是资产阶级，背绿挎包是红卫兵的时尚，麻袋便成为先生的首选。火车进入广东，觉得热，脱去棉袄，棉袄太旧，两个巡逻的乘警以为他是逃犯，盯着他看，见他与同车旅客谈笑自如，就走开了。他出去时带了 200 元钱，不可能装麻袋。回干校后，他向同志们讲述了那次冒险经历。想象大家肯定笑成一团，传来传去，便走了样。半导体收音机“文革”前就买了，带到临汾，串联时没带去，也被编到故事中。记得我读小学时，有篇课文大意是：某人吐痰发现一根雁毛，后传成吐了一只大雁。此文虽然夸张，确有现实意义。

还听说很多人给王先生介绍对象，他烦了，在门口贴一条：给我介绍对象者免进。经核对，也不实，却也有来由。王先生单身，自然有人给他介绍对象。在临汾干校，有次访贫问苦，老贫农讲家史，讲到一半，突然冒出一句：“你们老王不好，他不结婚。咱村有好几个寡妇，给他介绍一个。”大家楞住，也不敢笑，幸好有人反应快，说：“我们回北京给他解决，您继续讲吧。”才解围。门上贴条者是中文系一位教授，因求墨宝者众，难以应付。门上贴条曰：

大熊猫病了。不知为何安到王先生头上。真是名人趣闻多。

在临汾干校，王先生的任务是放羊，每天带一群羊去吕梁山边或山上，看着羊吃草，他可以看书，可以唱歌，想象先生在山上唱《黄水谣》，一定很舒畅，只是望不到黄河滚滚。我不知吕梁山风景如何，但在弥漫阶级斗争硝烟的“文革”期间，远离尘嚣的环境确是世外桃源。与羊为友，以书为伴，读书间隙，高歌一曲，不是神仙，却似神仙。先生在干校两年后，按理可以回去，却自愿多干一年。他说，若不是林彪事件后干校撤消，就不想回京了，这也是一种境界。

在干校，王先生曾与死神擦肩而过。一个星期日，他和严士健先生去山中玩，回来时看到路边有个用布缝的小白球，上面粘着一小片干肉，他俩认为是引狼用的，里面装有毒药。先生拾起带回，想在晚上当众剪开，供大家观赏。正在此时，一位复员军人匆匆赶来，大声说：“这是炸弹。”并把小球用力投到空地里，小球轰的一声爆炸了。幸亏有人及时处理，否则，啊！啊！四大金刚报销两个，怎么得了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倒是事实。王先生还说他不淘气，他7岁时，用剃刀在理发师脖子上划一刀。那次还想剪炸弹。他是：不淘则已，一淘惊人。

王先生对身外之物看得很淡。生活困难时，他有特供，每月一条烟，二斤肉，一斤鸡蛋，还有白糖。他的特供，烟归曹才翰，其余物品与邻居分享。刚改革开放时，一般家庭，若有海外关系或出国，家用电器便一应俱全，王先生多次出国，可买的电器大都放弃。1982年先生去美国 Cornell 大学参加数理逻辑讨论会，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，受到好评，登入论文集，发给他800美元奖金。那时在国内上课已有报酬，800美元是先生劳动所得，但他却上交了，且没要收条。那次先生可买一大一小两件电器，国内彩电还很少见，他没买，只在美国买了一个能编程序的小计算器，算是小件。这就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特质：单纯、清高。

我们1958年离开北师大后，近20年没进过北师大校门。虽然那里有着影响我们一生的痛苦经历，但也留有许多美好的记忆。我们坚实的业务基础在那里获得。也因此，我虽头上有帽，仍受学生尊敬。那些辛勤培育我们的老师怎样了？过去朝夕相处的同学怎样了？都很惦念。1965年我们在北京呆的时间较长，本想去北师大看看。发生了首都剧场的事后，再没动过去北师大的念头。

1977年，学校要我们招研究生，我跟着赵得春踏进北师大，若没有赵得春，我不会去，那时我右派身份没改正。20年过去，恍如隔世，物是人非，数学楼依旧，王先生还住在四合院，见赵得春和我去看他，很高兴。

“王先生要结婚了”，赵得春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消息。这个爆炸新闻让我们兴奋。问先生，方知又是误传。我们问他的生活状况，“我早和数学结婚了。”他诙谐地说：“我一个人生活得很好，后事也已安排，治丧委员会主任是汪培庄。”想起北宋处士林和靖隐居杭州孤山，不娶无子，植梅放鹤，有“梅妻鹤子”的千古佳话。王先生遨游在数学王国，以数学为伴，众多科研成果便是他的儿子，也是一段传奇。

先生仍一如既往地关心我们，青海缺乏资料，他帮忙寻找。有了成果，大加鼓励。我们的一篇文章寄给先生，他看后说可以投《科学通报》，并提出修改意见。一般论文下面都有收到稿件和收到修改稿两个日期，发表需要1年多到2年，而这篇文章从投稿到发表，仅花了8个月，只有一个投稿日期，因为先生把修改步骤让我们事先做了。

刚搬到新校，一次上课，先生讲伽罗华理论中一个定理，分很多种情况讨论，先生列了一张表。晚自习，突然发现上课讲的分类中有个小类与事实不符，我举了反例，不知是否正确，想找先生问清楚。去四合院，先生没找到，却摔一跤。第2天，在教室门口，我说了此事，先生很重视，后来上课，详细讲了这类情况，还说：“老师也有疏漏，如果同学发现，一定要指出，这样对我也是帮助。”先生的谦逊让大家十分感动。本来只是个小问题，不必大张旗鼓。先生却一丝不苟，他为我们作出良好榜样。先生还讲了王湘浩与特征2的故事，教育我

们对待科学必须十分严谨，来不得半点马虎。在老师们的教导下，我班同学形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。

王先生并非无原则的“好好先生”。他对目前学术上急功近利、压制他人、抄袭剽窃、弄虚作假等不良作风大加批评。先生认为：做学问应十分严肃。他提出：在科学、学术等领域应注意开展“讲正气”教育。他坚信：在任何学科中，如果没有健康严肃的优良学风，那么这一学科难以真正立足于世界。

小时候看父亲作画，他画竹，爱题“虚心直节亦傲霜”。画菊，爱题“落花无言，人淡如菊”。这两句话送给王先生都贴切。

“落花无言，人淡如菊”出自司空图《二十四诗品》中关于“典雅”的一段：“玉壶买春，赏雨茅屋。坐中佳士，左右修竹。白云初晴，幽鸟相逐。眠琴绿荫，上有飞瀑。落花无言，人淡如菊。书之岁华，其日可读。”先生不会玉壶买春，不可能眠琴绿荫，北京和临汾都看不到飞瀑。此情此景只能在山水画中见到。而这是一种意境，一种超凡脱俗的意境。

人淡如菊，不是平庸无奇，而是朴实和内敛。不是没有性格和特点，而是坚韧和独立。在先生的身上，严肃与随意并存，执着与淡泊并存。有权威无霸气，有才华不张扬。如菊花，散发淡淡清香，悠远，绵长。

#### 四、暮年中娱

叶圣陶、俞平伯的书信集称《暮年上娱》，指他们间的上等娱乐。我本想用此题目，先生认为与这两位前辈并论不自量力，故改用《暮年中娱》，可解释成“暮年中之娱乐”，也可解释为“暮年之中等娱乐”。

先生因吃流食，体力下降，目前只能在方圆 100 米内活动。但他精力依然充沛，思维仍旧活跃。

先生开始写回忆录，写了：《今生简忆：童年》《简忆旧天津》《简忆旧武威》《简忆旧酒泉》《简忆旧兰州》《简忆新旧北京》，这是先生一生的大事记，其中有些事件用专题写出。写了“文革”中的经历：《补行“大串联”》《晋东南见闻》《山村的鼓声》《山中拾炸弹》。还写了在国外的见闻：《美国印象》《西班牙印象》《德国印象》。先生还把这些文章录入电脑，这对一位 8 旬老人来说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马京然把它装订成册，标题是：王世强回忆录汇编，并加了按语。先生以惊人的记忆力又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宝贵财富。

回忆录写完了，再做什么呢？先生的独特思维又发挥了作用，他有自己的娱乐方式。

先生把唐诗、宋词作了新的解释，用笔名“王打水”写了《陪洋人听唐诗》《陪洋人听李煜词》《陪洋人听东坡词》等。对《四季歌》《天涯歌女》、京剧《苏三起解》、小说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也有新解。还不断给我出题，开始我还回答，但先生反应太快，实在招架不住，便用打油诗“打水先生太新潮，学生后面跟着跑，紧赶慢赶追不上，一不小心摔了跤”搪塞，当然没能蒙混过关，最后写了一篇《金猪年趣谈》交差。

先生又创建“B 派诗坛”，以爸爸给小学生儿子讲解唐诗、宋词、元曲形式写了大量作品。

也许是先生小时候不淘气，因此淘气因子在体内逐渐聚集，在晚年迸发。每天打开电脑，就会有新发现。先生寄来《苏三起解》，我寄去《三堂会审》。其中“沈官人”我解释成叫“沈官”的人，先生改为“升官的人”，又补充为“升高官的人”。我说：“升高官不如要高寿，再要 20 年够不够。”“不够不够，起码 300 年，若阎王不同意，讨价还价后，要 200 年也行。”“阎王请您去阴国讲学，您自己要去吧！”这就是《金猪年趣谈》中“忘了要高寿”的由来。

我们就这样你来我往地开心着，象打乒乓球，他发我接，我发他接。有时朱光琼也会加入，她解释了《天涯歌女》和李白的《静夜思》。我们俩人给先生写了一首《宝塔打油诗》：

王  
是强  
有名望  
黄河颂唱  
成就不寻常  
破格把讲师当  
模型论独霸一方  
数学系公认的金剛  
退而不休思维更盛旺  
唐诗宋词 B 派诗坛新创  
忘了黄昏老夫聊发少年狂

一次谈到刘钟灵，先生想与她联系，发去电邮却没回音，我告诉先生：“刘钟灵在美国有二个女儿，一个在中部，一个在加州，自己住纽约，她要走三个地方，不好找。”先生便写了一首打油诗：

灵走走何在  
未知何在灵走走，走遍天涯无尽头。  
另有行星八大座，可曾登箭去走走。

我回一首：

天涯海角到处走，不知何时是尽头。  
若是来日有音信，让她给您送问候。

先生又写：

是否去到外星球，那里美景不胜收。  
流连往返有可能，就怕氧气不不够。

我又回：

氧气不够不要紧，马上把水去打进。  
实在无法坚持住，快向地球来靠近。

先生又写：

外星并无化学家，把水打进也白搭。  
水里分解不出氧，地球虽在难回家。

我没词了，宣布投降。先生思维太敏捷了，所以总是我投降，有时还会被罚。

一天收到先生一首同韵小诗《嗡嗡轰》：

嗡嗡嗡，蜂蜂蜂；轰！轰！轰！（鼾声），翁（姓翁的老翁）梦中；蜂叮翁，翁梦醒。翁梦醒，送命令：“丁疯凤（媒母）：轰（驱赶也）轰蜂”；蜂蜂轰，烹生葱；生葱烹，蒸饼饼；饼饼蒸，烹鹰丁（此翁喜食鹰）；鹰丁烹，听听钟；丁疯凤：“中！中！中！”（豫语，即‘好好好！’也）蜂蜂轰，生葱烹，饼饼蒸，鹰丁烹，钟声听（已入夜）；疯（叫）醒翁。翁（吃）饼饼，翁（吃）生葱，翁（吃）鹰丁；翁轰！轰！（吃毕又入睡起鼾声！）嗡嗡嗡，蜂蜂蜂！（次日，蜂又至矣！）

先生让我按此韵和一首，我不会拼音，只好交白卷，因为态度好，先生对我“免于处分”。

先生为我班一些同学写了些藏头（身）诗：

罗承忠（藏头诗）

罗家有男名大姐，承继汪氏模糊业。

虽有微痒毫不怕，忠心耿耿数学界。

罗里波（藏身诗）

里波才华实罕见，岂不划右二十年。  
人大代表共候寝，群论判定大发展。

蒋滋梅（藏身诗）

蒋家有女名滋梅，颇赏科研美滋味。  
虽曾划右如冬梅，英雌早去令人哀。

他还写了自己的藏头诗：

王家也有糊涂蛋，世世代代确皆然。  
强扭西瓜并不甜，不信你就试试看。

发现有机可乘，我续了两句，改了些字，变成  
藏头诗

王家也有糊涂蛋（大智若愚），  
世世代代确皆然。  
强扭西瓜也会甜，  
不信你就试试看。  
简朴生活是祖传，  
单是打水不一般。

最近，先生还写了幽默小品《记郝钊新教授》：

郝钊新教授乃代数专家。彼与张禾瑞教授合著之《高等代数》（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54）讲解清晰，风行全国，将当时之中译奥库涅夫《高等代数》（杨从仁译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52，1953）及马力茨夫《线性代数基础》（柯召译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53）挤得纷纷落马。

彼文才极佳！曾在北师大数学系全体教师会上朗诵“说嫂嫂”及自编之“艾森豪威尔”，引得大家笑声不止。

郝君头秃，仅耳上一圈细发，头皮极亮！若涂油然。某年下午，王在一教室作课外讲演。天将夜，王乃请坐于电门旁之郝君开灯。郝君开灯之同时，摘去其灰帽，顿时室内大亮！若白昼然！引得哄堂大笑！王乃在课后赋一打油歪诗曰：“郝大官人灯泡亮！全校师生皆沾光！重要报告速请来，省下电费作报偿。”今年某日，王对杜文静君谈及此事此诗。杜君哈哈大笑！并和诗一首：“官人灯泡果不差！气死爱迪发明家！[注：爱迪生发明电灯]可惜天下独一份，否则奇异（灯泡公司）破产啦！”[注：奇异乃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之音译]

郝君善诗词。仅举二例如下：

[1]浣溪纱：（写“文革”中在北师大干校作炊事员）灶火虽小温度高，思想改造路遥遥，披星戴月乐陶陶。“完全”“彻底”常作鉴，斗私批修志愈豪，熟谓众口不能调。

[2]1971年国庆节重返南芦（干校附近一村庄）有感：“……去年国庆后，来此四十天。接受再教育，胜过二十年。黎明荷铣出，战地又斗天。社员迎我笑，热情暖心田。教我识麦菽，教我握锄镰。同饮一缸水，同进一席餐。同歌跃进曲，同谱斗私篇……。”此乃记述“文革”中在山西临汾干校劳动之愉快心情也。

看了此文，谁都会大笑不止。也会钦佩先生的文才。

先生又与杜文静、王薇合写了相声《考证百家姓》。与杜文静合写了《我们的好友物理史名家戈革教授》《记代数名家刘绍学教授》、中英对照新水浒《武松打虎》，其中《武松打虎》已被复旦大学办的《大学英语》录用。

有人说：高官不如高薪，高薪不如高寿，高寿不如高兴。先生没当过高官，现在工资肯定没有他的学生高。但先生高寿，而且高高兴兴地过着每一天。“开心是福”。在晚年，先生用智慧给自己生产快乐，也给别人带来快乐，他正在优雅地慢慢变老。

2007年12月1日